

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就业水平的影响

——来自中国276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姜文辉, 张婧奕, 余欣圆

(集美大学 财经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本研究基于2004—2019年中国276个地级市数据, 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高了其所在城市的就业水平, 相对于未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 该政策的推行使自贸试验区所在城市的就业水平平均增加约10.6%。从分区域结果来看, 相比于沿海, 内地自贸试验区对就业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从分时间结果来看, 第1批自贸试验区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更突出, 且随着自贸试验区设立时间的推移, 其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逐渐减弱。机制分析结果显示: 自贸试验区的设立通过增加外资流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2个维度提高当地就业水平。

[关键词] 自由贸易试验区; 就业水平; 外资流入; 产业结构升级

[中图分类号] F 752.8; F 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4) 04-0029-09

一、引言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自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建立, 到2023年, 中国已分7批设立了22个自贸试验区(港), 形成覆盖4个直辖市和18个省份, 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目前, 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已启动10年, 10年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利用国内国外2种资源、2个市场, 积极探索行之有效、可复制推广的对外开放规则, 推动制度型开放, 自贸试验区已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抓手。

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沿阵地, 自贸试验区不同程度上对投资、生产、流通以及消费等不同领域产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 劳动者必然会面临着不同就业岗位的调整、竞争和淘汰, 因此, 对劳动者就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么, 自贸试验区

的设立是否会提升就业水平? 其影响机制是什么? 自贸试验区的地理位置不同是否会导致政策效果不同? 不同批次的自贸试验区对就业的影响是否不同?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正处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就业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 实现“稳就业, 惠民生”这一目标极为重要。因此, 研究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就业的影响, 科学地回答上述问题, 对稳定宏观经济、保障民生以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自贸试验区自设立以来受到较多的关注, 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对自贸试验区进行研究, 目前与本研究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一) 自贸试验区政策评估的研究

自贸试验区作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实践形式和空间载体, 自设立以来便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相关研究也日益丰富。匡海波等运用PCA-TOPSIS模型测算了天津、上海、广东、福建4个地区自贸试验区的开放水平; 刘天寿等构建了

[收稿日期] 2023-09-01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面上项目“‘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福建自贸试验区建设问题研究”(JAS21113)

[作者简介] 姜文辉(1980—), 女, 山东青岛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及世界经济研究。

RFWT模型对自贸试验区的科技创新水平进行评价^[1-2]。在经济效应方面,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提高了我国对外贸易自由化水平,加速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并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且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会对区域经济产生辐射效应和虹吸效应^[3-4]。具体表现为,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周围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与自贸试验区距离增加表现出先变小、再变大、再变小的趋势^[5];在外资利用方面,有学者利用年度省级面板数据和合成控制法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实际利用外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促进效果方面OFDI优于FDI^[6];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方面,自贸试验区的设立通过创新驱动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7];在绿色环保方面,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降低地区碳排放,以及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式改善大气环境状况^[8-9];从微观层面来看,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融资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并且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10-12]。同时,部分学者对自贸试验区的收入分配效应、金融开放、城市创新等进行了研究^[13-14]。

(二) 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影响的研究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问题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与时间和企业类型有关,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入世后关税降低引致的外需扩张对制造业就业的促进效果随时间递减,且贸易开放引起贸易企业的就业波动明显高于非贸易企业^[15-16]。贸易自由化对就业产生的影响主要有2个方面:就业创造和就业破坏。贸易自由化更多地促进了就业的创造,对就业破坏的影响较小^[17]。同时,有研究表明,中间产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就业有促进作用,其就业创造的作用大于就业破坏的作用^[18];有学者从出口导向率和进口渗透率两方面研究自由贸易对工业就业的冲击,研究发现,出口导向率可以促进就业的增加,进口渗透率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19];对服务业来说,服务业开放会促进就业水平提高,出口导向率与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呈负相关,而进口渗透率和实际产出

与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呈正相关^[20-21];张红丽和贾楠利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贸易开放度对就业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通过提高贸易自由化程度和改善劳动力需求弹性显著提升了就业水平^[22];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企业就业的影响为正,对内销企业存在负面影响^[23]。

(三) 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就业影响的研究

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提高了我国贸易自由化的程度,有学者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也会对就业水平产生影响。马国旺等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模拟了假设上海市没有设立自贸试验区的非正规就业人数走势,并与上海市真实的非正规就业人数作比较,研究表明,上海自贸试验区对上海市非正规就业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4];张玮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自贸试验区的成立有效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25];曹翔等利用城市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对所在城市就业水平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周边非自贸试验区城市的就业表现出辐射效应^[26]。本研究采用地级市面板数据,从不同路径分析了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同时深入分析了自贸试验区设立的时间、地理位置的不同对就业水平产生的影响。

可见,目前有关自贸试验区评价以及对就业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以上文献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如下:(1)采用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自贸试验区对就业的影响。从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文献来看,自贸试验区对就业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主要围绕自贸试验区对投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技术创新等的影响展开,对就业影响的研究主要针对上海自贸试验区或者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采用地级市数据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将拓展在该领域的研究,基于276个地级市数据,对前三批自贸试验区的就业效应进行探讨。(2)从外资流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2个维度探析自贸试验区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同时,本研究进一步探索自贸试验区对就业影响的复杂性,就自贸试验区设立批次和所在区位进行异质性分析。

三、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自贸试验区建设与外资流入

自贸试验区建立以来, 外商投资准入限制不断降低, 具体体现在负面清单制度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目前, 2021 年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缩减至 27 项, 2024 年版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缩减至 68 项。自贸试验区内要素流动加速, 贸易投资质量提升。同时, 自贸试验区不断探索制度创新, 为外资进入提供透明化、规范化的监管和服务体系,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这为外资进入提供制度保障, 降低了外资进入的不确定性。因此, 自贸试验区的设立, 增强了其在引进外资方面特定的区位优势, 与其他地区相比, 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地区, 吸引外资的规模相对更高^[27]。

FDI 进入东道国对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并通过增加就业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发展^[28]。一方面, 外资企业的进入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的集聚, 促进东道国产业的发展, 从而为当地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 随着自贸试验区内外资企业的进入, 为外资企业提供中间品的上游产业竞争加剧, 从而导致中间品价格下降^[29]。同时, 上游产业集聚带来的外部规模效应也会促使中间品价格降低。在这一过程中, 本土企业的利润增加, 融资压力减小。研究表明, 外资进入可以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程度促进企业就业增长^[30]。最后, 外资企业的国际化能力较强, 可以更为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 从而带动我国出口的增加, 而出口扩张会带来就业创造效应。因此, 自贸试验区的设立, 可以增加外资流入、扩大企业规模、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从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失业人员也更容易回到工作岗位, 减少摩擦性失业。基于此, 提出假说 1: 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吸引外资流入, 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从而使就业人数增加。

(二) 自贸试验区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

自贸试验区的“单一窗口”“先入区, 再申报”“负面清单”以及“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政策使贸易和投资更加便利化。通关效率的提升和出口成本的降低, 有助于拓展海外市场, 优化资

源配置, 提高劳动分工的专业化程度。同时, 自贸试验区的影响还会辐射到周围地区, 带动周围地区发展, 形成产业聚集。因此, 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有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又会带来就业增长。一方面, 产业结构升级中, 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 从而促进企业生产规模扩大, 并带动就业的增加^[31]; 另一方面, 产业结构通过不断优化, 会延伸出更多的新兴产业, 从而拓宽就业方式, 提高就业率^[32]。同时, 产业结构在高级化过程中, 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提升, 而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产业。韩元军认为, 通过产业升级充分发挥服务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 是促进就业的有效举措^[33]。因此, 产业结构高级化可以有效扩大就业总量。基于此, 提出假说 2: 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从而提升就业水平。

四、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计

本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 (DID), 以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作为政策试验。一方面, 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在政策前后就业会产生差异; 另一方面, 在同一时点上, 设立自贸试验区与没有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在就业上也具有一定差异。考虑到我国是分批次设立自贸试验区, 因此, 本研究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回归分析, 并设定如下模型:

$$\ln E_{it} = \alpha + \beta Z_{it} + \sum_{j=1}^N \varphi_j C_{it} + \eta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Z_{it} = T_i \times P_t$$

其中, E_{it} 为各城市就业人数的衡量指标, 表示城市 i 在 t 年的就业人数, 是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 Z_{it} 表示自贸试验区指标, 其为时期虚拟变量 (P_t) 与处理组虚拟变量 (T_i) 的交互项是核心解释变量; C_{it}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 包括城市工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政府支出水平; η_i 表示城市固定效应, γ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是残差项。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统计年鉴》。鉴于 2020 年以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不再公布民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据，故采用 2004—2019 年中国 276 个城市数据，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就业的影响。以成立时间较长的前三批自贸试验区下辖片区城市为实验组，实验组城市有 22 个，包括上海、天津、福州（平潭片区并入）、厦门、广州、深圳、珠海、沈阳、舟山、大连、营口、武汉、宜昌、成都、襄阳、重庆、泸州、西安、咸阳、郑州、开封、洛阳，对照组城市为 254 个。剔除掉新疆、西藏数据缺失较多的省份和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其余缺失值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1. 被解释变量。各城市总就业人数（ E ）：总就业人数为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与城镇民营和个

体从业人员的总和。

2. 解释变量。自贸试验区（ Z ）指标为哑变量，如果城市 i 在第 t 年获批设立自贸试验区，则第 t 年及以后 Z 的取值为 1，否则为 0。由于本研究时间为 2004—2019 年，2018 年以来设立的自贸试验区观测时间较短，因此，只将前三批自贸试验区下辖片区城市作为实验组。

3. 控制变量。为更准确地考察自贸试验区建设对就业的影响，本研究加入相应控制变量。城市工资水平（ W ）采用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经济发展水平（ G ）采用人均 GDP 进行衡量；消费水平（ R ）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衡量；人力资本水平（ H ）采用高等学校人数衡量；政府支出（ O ）采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相关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符号	含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就业人数	$\ln E$	总就业人数的对数	4 194	4.201	2.939	5.798
自贸试验区	Z	是否设立自贸试验区	4 194	0.020	0	1
城市工资水平	$\ln W$	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	4 194	10.452	8.733	12.678
经济发展水平	$\ln G$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数	4 194	10.279	4.595	13.056
消费水平	$\ln R$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对数	4 194	15.146	5.472	18.881
人力资本水平	$\ln H$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的对数	4 194	10.470	5.485	13.958
政府支出	O	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	4 194	17.122	4.049	193.638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双重差分法（DID）的回归结果见表 2，列（1）和列（2）分别为不考虑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自贸试验区（ Z ）的系数估计分别为 0.098 和 0.106，且都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可以看出，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显著促进了所在城市就业人数的增加。列（2）的系数略大于列（1），表明控制变量中存在影响就业的因素。列（2）的估计结果表明，相比于没有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就业平均上升 10.6%。这意味着，在自贸试

验区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措施进行制度创新，能够提高自贸试验区的就业水平。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①

变量	(1)	(2)
	$\ln E$	$\ln E$
Z	0.098 *** (0.030)	0.106 *** (0.029)
—cons	4.215 *** (0.004)	2.505 *** (0.806)
样本量	4 184	4 184
控制变量	N	Y
地区效应	Y	Y
时间效应	Y	Y

① 表中括号内为标准差，*、**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 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假设是双重差分模型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之一，即在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之前，受政策影响的城市和未受政策影响的城市之间就业水平无显著差异。本研究以自贸试验区设立前的第 1 期为基期进行平行趋势检验（见图 1）。图 1 显示，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前各期的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即设立自贸试验区和没有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其就业水平在政策实施前并无显著差异。在政策实施的第 5 期、第 6 期受政策影响的城市和未受政策影响的城市之间就业水平才有显著差异，因为外资的实际到位、跨国公司成立过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会产生滞后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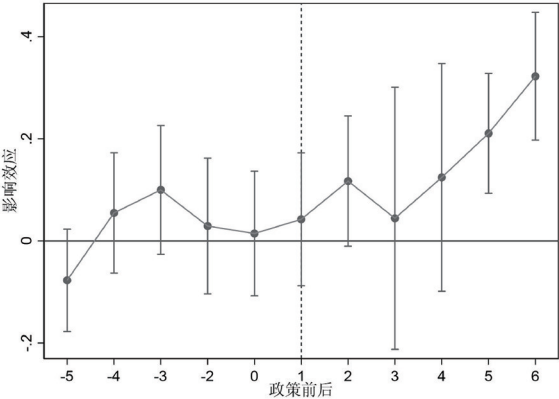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被解释变量。就业数量有很多种衡量方法，根据王锋等的做法，用城市平均在岗职工来衡量城市就业人数^[34]，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更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1) lnE	(2) lnE
Z	0.116 *** (0.020)	0.109 *** (0.020)
_cons	3.479 *** (0.003)	5.437 *** (0.929)
样本量	4 184	4 184
控制变量	N	Y
城市效应	Y	Y
时间效应	Y	Y

列（1）和列（2）分别为不考虑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2 种情况下，自贸试验区（Z）的系数估计分别为 0.116 和 0.109，且都在 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在更换就业人数衡量指标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依然显著促进了所在城市的就业水平，说明该模型是稳健的。

2. 剔除直辖市样本。鉴于直辖市的特殊性，本研究参考司春晓等的做法，将直辖市样本剔除，再将样本进行回归^[27]，回归结果见表 4。列（1）为不考虑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自贸试验区（Z）的系数估计值为 0.100，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列（2）为考虑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自贸试验区（Z）的系数为 0.106，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列（2）估计结果表明相比于没有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设立自贸试验区的城市就业平均上升 10.6%。可见，在去掉直辖市样本后，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就业水平仍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对就业水平的影响在引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之后仍然显著，进一步说明了该模型的稳健性。

表 4 剔除直辖市样本

变量	(1) lnE	(2) lnE
Z	0.100 *** (0.034)	0.106 *** (0.032)
_cons	4.177 *** (0.004)	2.460 *** (0.812)
样本量	4 120	4 120
控制变量	N	Y
地区效应	Y	Y
时间效应	Y	Y

(四) 安慰剂检验

为了进一步排除影响基准回归结果的其他政策变量或遗漏变量，本研究对回归模型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过程为，在 276 个样本城市中随机抽取 22 个城市作为虚拟的自贸试验区试点城市，用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并将该过程重复 500 次，得到的结果如图 2 所示。从图 2 中可以看出，500 次回归结果的系数均值趋近于 0 且服

从正态分布，安慰剂检验估计系数离真实系数较远，一定程度上说明基准回归模型不存在识别偏误，因此，该模型通过了安慰剂检验，也进一步验证了该模型的稳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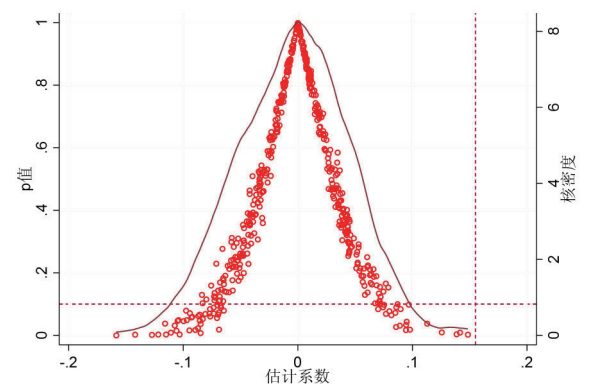


图 2 安慰剂检验

六、异质性分析与机制检验

（一）区域异质性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不同，自贸试验区政策在不同地区可能会产生不同影响。因此，本研究将自贸试验区按所属省份的地理位置特征划分为沿海型和内陆型，分别估计不同区域自贸试验区的就业效应。其中，沿海型自贸试验区包括上海、厦门、福州、广州、深圳、珠海、天津、舟山、大连、沈阳和营口；内陆型自贸试验区包括武汉、襄阳、宜昌、郑州、开封、洛阳、重庆、成都、泸州、西安和咸阳。回归结果见表 5。内陆型自贸试验区的回归系数为 0.106，且在 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沿海型自贸试验区的回归系数为 0.083，系数为正，但未通过 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列（1）和列（2）结果相比，处在内陆的自贸试验区促进就业水平提升的效果比较明显，而处在沿海的自贸试验区对就业水平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沿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即使没有设立自贸试验区，也有很多劳动力流入。因此，在内陆设立自贸试验区对就业的影响可能更为突出。

表 5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内陆	沿海
<i>Z</i>	0.106 *** (0.037)	0.083 (0.056)
_cons	2.346 ** (0.913)	3.760 * (2.226)
样本量	3 496	688
控制变量	Y	Y
地区效应	Y	Y
时间效应	Y	Y

（二）批次异质性

考虑到不同时间成立的自贸试验区的实际效果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将自贸试验区分为 3 批，分别是 2013 年成立、2015 年成立和 2017 年成立，回归结果见表 6。从整体来看，第 1 批、第 2 批、第 3 批设立的自贸试验区，都明显地促进了自贸试验区所在城市的就业水平。第 1 批自贸试验区（*Z*）的回归系数为 0.252，且在 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第 2 批自贸试验区（*Z*）的回归系数为 0.113，且在 5%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第 3 批自贸试验区（*Z*）的回归系数为 0.080，且在 5%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3 批设立的自贸试验区均对所在城市的就业水平有促进作用，且对就业水平的影响随着自贸试验区设立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可能的原因是，早先批次的自贸试验区分布较为分散，相互之间在吸引劳动力流入上不存在很强的竞争，应该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同时，随着时间推移，相关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等在区外复制推广，从而导致自贸试验区政策的效果减弱。

表 6 批次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第 1 批	第 2 批	第 3 批
<i>Z</i>	0.252 *** (0.052)		
<i>Z</i>		0.113 ** (0.051)	
<i>Z</i>			0.080 ** (0.036)

续表 6

变量	(1) 第 1 批	(2) 第 2 批	(3) 第 3 批
_cons	2.543 *** (0.810)	2.519 *** (0.811)	2.605 *** (0.803)
样本量	4 184	4 184	4 184
控制变量	Y	Y	Y
地区效应	Y	Y	Y
时间效应	Y	Y	Y

（三）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机制分析，自贸试验区政策可能会通过吸引外资进入影响就业。为验证这一机制，该部分用与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F ）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用于验证自贸试验区政策通过吸引外资进入对就业的影响（见表 7）。表 7 列（1）展示了自贸试验区对外资进入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 Z 的系数估计值为 0.248，且在 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度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政策促进了外资流入。外资进入对就业水平的影响体现在 2 个方面：（1）跨国公司并购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2）外资进入会增加上游行业产品竞争、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利润、扩大出口规模，同时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由此，假说 1 成立。

表 7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ln F$	(2) S
Z	0.248 *** (0.071)	0.073 *** (0.030)
_cons	-8.820 *** (1.952)	5.596 *** (1.080)
样本量	4 043	4 184
控制变量	Y	Y
地区效应	Y	Y
时间效应	Y	Y

为验证自贸试验区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就业，该部分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

值的比值（ S ）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用于验证自贸试验区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影响。表 7 列（2）展示了自贸试验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自贸试验区（ Z ）的系数估计值为 0.073，且在 1% 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自贸试验区设立对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产业向服务业转移升级，而服务业大部分部门属于劳动密集型，可以吸纳其他产业转移的劳动力，促进就业人数增加。由此，假说 2 成立。

七、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结论

本研究基于 2004—2019 年中国 276 个地级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设立自贸试验区对其所在城市就业的影响，并探讨其影响机制。得出如下结论：（1）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显著提高了其所在城市的就业水平。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设立后，就业水平平均增加了 10.6% 左右。（2）自贸试验区对就业的影响在不同自贸试验区具有异质性。在不同地理位置的自贸试验区中，自贸试验区政策对内陆城市就业水平的促进作用强于沿海城市。在不同批次的自贸试验区中，第 1 批自贸试验区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最强，随着自贸试验区设立时间的推移，其对城市就业水平的影响逐渐减弱。（3）自贸试验区的设立通过吸引外资、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就业。研究结果表明，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增加了外资流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外资流入使劳动的岗位和需求增加，在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第三产业会吸纳其他产业转移的劳动力，从而提高城市就业水平。

（二）政策启示

1. 总结和推广自贸试验区经验，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对外开放，稳定和促进就业。自贸试验区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其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要加快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开放型经济能级。在此基础上，加快总结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推广至全国，逐步由点及面，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提升全

国就业水平。

2.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积极推进贸易与投资便利化, 强化引资力度, 进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要进一步合理缩减负面清单, 提高负面清单的公开度和透明度, 降低外商投资的进入壁垒。同时, 要拓展服务贸易领域开放, 改善投资环境, 为外资进入提供政策支持, 加快新兴服务贸易发展, 提升自贸试验区对当地就业水平的促进作用。

3. 结合地区特色, 各地根据自身优势产业的发展 and 布局, 制定不同政策以提升就业水平。不同地区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不同, 适合的发展方案也存在差异。不同地区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特点, 完善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制度。沿海型自贸试验区应积极提高服务业的开放水平, 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提高就业水平。内陆型自贸试验区可结合当地产业特征, 加快产业链招商, 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 吸引大型跨国公司, 发挥外资企业对当地就业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匡海波, 刘天寿, 刘家国, 等. 基于 PCA-TOPSIS 的自贸区开放水平测度研究 [J]. 科研管理, 2018, 39 (3): 69-79.
- [2] 刘天寿, 匡海波, 周欢, 等. 基于 RFWT 的自贸区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2020, 46 (4): 85-94.
- [3] 蔡玲, 杨月涛. 自贸区政策与经济增长 [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 (6): 68-76.
- [4] 胡艺, 张义坤, 刘凯. 内陆型自贸区的经济外部性: “辐射效应”还是“虹吸效应”? [J]. 世界经济研究, 2022 (2): 54-72.
- [5] 崔日明, 陈永胜, 李丹. 自贸试验区设立与区域经济增长: 基于动力机制与空间带动效应的研究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1 (11): 1-20.
- [6] 韩瑞栋, 薄凡.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视角 [J]. 国际金融研究, 2019 (7): 36-45.
- [7] 冯锐, 陈蕾, 刘传明. 自贸区建设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效应研究 [J]. 经济问题探索, 2020 (9): 26-42.
- [8] 邵良杉, 毕圣昊, 王彦彬. 自贸区试点政策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效应: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 [J]. 企业经济, 2023, 42 (2): 48-58.
- [9] 胡宗义, 周积琨, 李毅. 自贸区设立改善了大气环境状况吗?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2, 32 (2): 37-50.
- [10] 许江波, 董启琛, 卿小权. 自贸区政策如何影响企业价值: “双循环”视角下的分析与检验 [J]. 会计研究, 2022 (10): 85-98.
- [11] 吕洪燕, 孙喜峰, 齐秀辉. 制度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来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证据 [J]. 软科学, 2020, 34 (10): 76-83.
- [12] 敬莉, 孙哲远. 自贸区设立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J]. 华东经济管理, 2023, 37 (4): 47-55.
- [13] 许晨曦, 董启琛, 许江波. 自贸区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管理评论, 2023, 35 (2): 38-51.
- [14] 李琼, 吴小雨, 成春林.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金融开放的影响研究: 以上海自贸区为例 [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1 (10): 34-44.
- [15] 陈朴, 孙丹. 中国入世的贸易冲击及其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J].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36 (3): 76-84.
- [16] 史青, 赵鑫, 万山等. 贸易开放、异质性企业与就业波动 [J]. 世界经济文汇, 2022 (3): 17-33.
- [17] BOTTINI N, GASIOREK M. Trade and job reallocation: Evidence for Morocco [R]. [2023-07-15]. <https://biblio.liuc.it/liucap/pdf/224.pdf>. LIUC Papers: Economics, 2009.
- [18] 毛其淋, 许家云.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 来自中国加入 WTO 的微观证据 [J]. 经济研究, 2016, 51 (1): 69-83.
- [19] 俞会新, 薛敬孝. 中国贸易自由化对工业就业的影响 [J]. 世界经济, 2002 (10): 10-13.
- [20] 孙湘湘, 周小亮. 服务业对外开放、结构变迁与就业 [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9, 36 (7): 94-105.
- [21] 吕义军, 李秉强. 我国服务贸易对服务业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J].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28 (4): 6-10.
- [22] 张红丽, 贾楠. 贸易开放度的就业效应研究 [J]. 工程管理科技前沿, 2022, 41 (6): 89-96.
- [23] MOUELHI R B A, GHAZALI M. Impact of trade reforms in Tunisia on the elasticity of labour demand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3, 134: 78-96.
- [24] 马国旺, 杨洋. 高水平对外开放对非正规就业影

- 响的实证检验: 基于上海自贸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7 (1): 128-140.
- [25] 张玮. 自贸区成立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 [D]. 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 2022.
- [26] 曹翔, 张双龙, 余升国. 自贸试验区的就业效应: 虹吸还是辐射 [J]. 当代财经, 2020 (11): 3-14.
- [27] 司春晓, 孙诗怡, 罗长远. 自贸区的外资创造和外资转移效应: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PSM-DID) 的研究 [J]. 世界经济研究, 2021 (5): 9-23.
- [28] 蔡昉, 王德文. 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 一个人力资本分析框架 [J]. 财经论丛 (浙江财经学院学报), 2004 (1): 1-14.
- [29] 毛其淋. 外资进入自由化如何影响了中国本土企业创新? [J]. 金融研究, 2019 (1): 72-90.
- [30] 韩国高, 邵忠林, 张倩. 外资进入有助于本土企业“稳就业”吗: 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1 (5): 81-95.
- [31] GARCIA A, JAUMANDREU J, RODRIGUEZ C. Innovation and jobs: 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firms [R]. MPRA Paper, 2004.
- [32] 王可昕, 朱冠文. 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 基于我国地区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J]. 市场周刊, 2020, 33 (10): 41-44.
- [33] 韩元军. 就业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 33 (6): 20-26.
- [34] 王锋, 葛星. 低碳转型冲击就业吗: 来自低碳城市试点的经验证据 [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 (5): 81-99.

On the Impact of Pilot Free Trade Zones on the Employment: 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27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JIANG Wenhui, ZHANG Jingyi, YU Xinyuan

(Finance and Economics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276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9,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pilot FTZs on employment by using th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 metho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pilot FTZ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employment of the cities in which they are located, by about 10.6% on average, compared with cities without implementing this policy. In terms of results by region, the effect of inland pilot FTZs on the employment is more pronounced compared to coastal ones. In terms of the results by time, the first pilot FTZs play a more prominent role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and their impact on employment gradually diminishes as time passes. The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 that pilot FTZs improve the local employment through two dimensions: increasing the inflow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 words: pilot free trade zone; employment; inflow of foreign investment;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责任编辑 陈蒙腰)